

▼ 牟宗三文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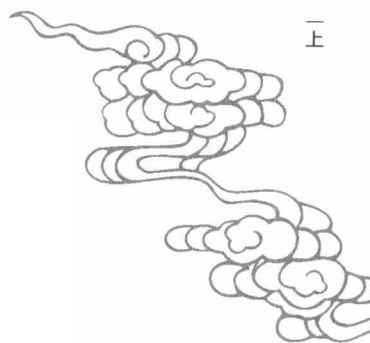
主编 吴兴文

牟宗三

康德：
判断力之批判——上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康德：
判断力之批判
二上



出版说明

牟宗三先生（1909—1995），被认为是当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师承于熊十力先生，熊先生称之为北大哲学系“唯一可造之人”。牟先生与唐君毅先生、徐复观先生并肩而立，号称熊氏的三大弟子。

牟宗三先生终生勤勉治学，致力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复兴和更新，为正在消逝的中国文化传承血脉之存亡续绝而奔走呼号。清季民初以来的人文复兴课题，使中国的知识界一直处于困扰和焦虑状态，主流对于目迷五色的现代物质文明的追慕，催促中国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图腾崇拜时代，传统的中国文化被看做过时和不时髦的而被“打扫”，新儒家所发出的不同的声音完全被淹没。延至当下，或者稍早些，中国突然发觉自己面对的是传统的破碎败坏和“洋泾浜”式的现代化，人文复兴走向了误区，诉诸和回归传统再次成为一个轮回的主话题。于是，中国知识界“发现”了新儒家，也“发现”新儒家思考的价值。国内出版界也开始陆续出版牟宗三的作品，并一度形成了“牟宗三热”。

有趣的是，国人的研究领域也如同时尚界，凡思想成为某种时髦的时候，也是它即将过时的时候。这造成了我们对大部分的有价值的思考略知皮毛而已。想牟宗三先生也难免此一规律，且因为种种原因，牟宗三作品的出版分散于多家出版社，当然也不完整。基于这些考量，吉林出版集团计划出版一套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牟宗三文集》。在此过程中，幸而获得台湾“学生书局”等出版界同人的支持，促使此一计划得以成行。

这套《牟宗三文集》我们遴选了牟宗三先生最重要的著作，包括《中国哲学的特质》《道德的理想主义》《中国哲学十九讲》《佛性与般若》《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名家与荀子》《历史哲学》

《才性与玄理》《圆善论》《现象与物自身》《人文讲习录》《政道与治道》《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共计十三种，其中《圆善论》等五部作品为中国大陆首次出版。

出于对牟宗三先生作品的尊重，我们在稿件编辑过程中，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由于牟宗三先生的政治观点与我们有一定差异，所以我们并不赞成牟宗三先生在某些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判断方面的表述，尽管如此，凡属学术讨论范畴领域的内容，我们除作了个别修改外，尽量均予以保留，以不伤害作品完整性为第一原则。希望读者在阅读中能够采取拿来主义观点，借鉴吸收其有益的建设性的部分。

编者

创业垂统：典范的学思生命 和哲学创造

——序《牟宗三文集》

一、小引：题说

吉林出版集团筹划的《牟宗三文集》即将印行之届，电邀我写一篇序。电话中，我告诉联系的编辑，（关于）牟先生的事，在我，是第一位。故虽恰逢忙头，仍乐于允命。此“序”，当对了解牟先生提供一个总体观始能相应。唯距印行的时间极为急促，只能勉力而为。

牟先生八十大寿时尝云：他从大学读书以来，六十年只做一件事，是即“反省中华民族之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的途径”。牟先生亦尝手书示我：“吾一生无长，只是一个学思生命之发展。”时年，牟老师八十五岁。越二年，牟先生逝。我寝馈牟学三十年，尚可言有感受，又经反复慎思，自感“典范的学思生命和哲学创造”这句话确可以概括牟先生的一生努力和贡献，亦未曾失上揭牟先生自我概括之意蕴。唯此“典范”和“创造”是在历时弥久的反儒反传统中，在中国文化和儒学大厦被倾倒毁弃中，在牟先生判之为中华民族“最倒霉的时代”、国族历史“大患难”的时代、中国文化“大危疑的时代”，“争剥以复”成就的，故而有“创业垂统”的意义。唯其是“创造”，故而是“创业”；唯其是“典范”，故而能“垂统”。乃以“创业垂统：典范的学思生命和哲学创造”敬以为题，序吉林版《牟宗三文集》。

二、从圣贤之乡走出来的大哲学家

牟先生是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当代新儒家大宗师。但我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牟先生是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大哲学家，而这亦将透显出他的“学思”与“生命”的意义，透显出他的学思生命之发展是个无穷的奋斗。

孔门以“博学以文”为训，又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当是牟先生“学思”生命的义涵。如同孔子吾十五有志于学云云，牟先生亦有个凸显“学思”对生命成长意义的生命发展观，以“学思”为分程杆竿将吾人生命划为“学思”前后两大程。他自述他的学思前生命是在混沌中成长的自然生命，其中虽无学问以及通过学问而凸显的形式真理，但却有性情，亦有光彩。而学是自然生命之一曲，学思生命是自然生命通过学之一曲的发展。从混沌的自然生命放射出来的一道一道的清光，每道都在曲折的间接发展中。牟先生说，那些清光之曲折的发展也决定他的学的生活所注意的领域与境界，以及其路线途径与形态。（《五十自述》，台北，鹅湖出版社，1989年1月，第18页）牟先生的学思生命发展观，还另有其深刻的哲学义蕴，兹不论，我要说的是，牟先生的自述亦在说明，学思前的自然生命对于学思生命非无意义。大约一些大哲学家、大思想家的早年生活对其思想都有或多或少的构成性，都有早年意识元素。当代新儒家巨子如此，牟先生亦然。这可能已可认定为当代新儒家第三代的刘述先先生于1983年，将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梁漱溟“四大学问家的青少年时代”编为《生命的奋进》（《百姓》半月刊出版）的缘故。

牟先生是一个农家子弟，逊清宣统元年己酉四月十五日（1909年6月12日）生于山东栖霞牟家疃。山东是孔孟圣贤之乡。栖霞则道家全真教邱处机大宗师的家乡，山川灵秀，村落疏朗，邱道长说过“走遍天下，不如我小小栖霞”。牟先生的《五十自述》留引了这句话。牟家疃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的乡村。从牟先生的

记述中，可以了解到，当年的牟家疃，村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扫墓、过节，演戏酬神，贴合着人情人性，不失人伦教化之正，顺适谐和而根深蒂固，民风淳厚朴质，“安其居，乐其俗”，日用而不知地保存着儒家礼俗中道。牟家是个“天天忙于生活的穷困家庭”，但也是世代耕读相续的传统家族。牟先生之父，名荫清，刚毅守正，有令誉于乡里。常读曾文正公家书，至晚又常讽诵古文，牟先生常旁听，“心中随之极为清净纯洁”。父亲以“典型的中国文化陶养者”、“有坚定的义理信念的人”、儒家“义理教训之存在的见证者”，一直留在牟先生的记忆和生活中。父亲的写字“整齐不拘”后来也成为牟先生的一个终身良习。乡村的礼俗气氛，少年的牟先生感觉颇有情味，舒畅亲和，感觉与自己的生命有自然的契合，生命在其自己；祭礼中更感着生命通着祖宗、神明，有通着思古幽情的愉悦；自戏娱中，也有着独立自足的形构之兴趣，没有任何实用目的之内在情趣，又表现出强度的直觉力；与旷野相处，升起苍茫寥廓感、落寞而不落寞的浑然感。直到民国十六年（1927）考入北京大学，牟先生才结束了这样的村居生活。

礼失而求诸野。清末民初的村野人伦礼俗文化，去古未远，正是社会学意义的中国文化的小传统，它不仅保存着中国文化的大传统，更是后者的源头活水。（余英时台北版《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之《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未收入南京版同名书，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士与中国文化》，1987年12月，第134页。）“安土敦乎仁。”牟先生与村野礼俗文化的契合，养成的喜欢最直接的生命与人格的生命格调和情味，他心中所亲切喜悦的是与土接近的农民，喜欢与苍茫寥廓接近的荒村野店的赶马者，这表明传统文化及其义理教训在牟先生的生命中是生了根的。至于通向祖宗、神明的思古幽情以及种种情趣、能力、感觉，以及在《说还乡》一文所表达的强烈的存在感受，则都表示出哲学的天赋与哲学的潜质。那些混沌的感觉，是原始的哲学意境，经过反省、凝聚、提炼，就会贞定为对现实政治与现实世界的距离感、超越感与宇宙情怀，而铸造真实的学思生命和哲学风格。牟先生是一

个有什么就说什么即“最直接的人格”的真人，他自己就明确说过，他少年时代对圣贤的“嘉言懿行”如陆象山的话头、朱子治家格言之很有兴趣，就表示他的兴趣是个“读哲学的头脑”（樊克伟整理《学思·译著——牟宗三先生访谈录》，台北，《鹅湖》，1992年12月）。

新文化运动后的民初中国社会，城市与乡村是脱了节的。那时北京的气氛，据牟先生所观感，是“绝对的粗犷的唯物论所促成的放纵恣肆”的“大浪漫精神”。牟先生因为“青年”，因为“混沌”，“也沾染了那泛滥浪漫的精神”，也为吴稚晖“漆黑一团的宇宙观”所吸引。但有根的生命终归要内转回归生命之在其自己的。唯其中国文化的义理教训在生命中生了根，所以牟先生在被沾染的同时即觉察“八字驳杂”的国民党党人的唯物论观念和“纯是经济决定的”阶级意识，抹去了中国流行几千年的人品人格的观念，是“外在的非人观念来在农民身上妄生分别”，而迅速从左倾浪漫中撤退；继在父亲斥时代风气的棒喝下，思想和生命“顿时从漆黑一团的混沌中超拔”。从他父亲身上，他亲切地觉得这时代的浅薄知识分子妄逞聪明，全是无坚定的生根的义理信念，只是浮薄的投机取巧，来践踏斫丧民族的生命。认为这就是思想观念极端泛滥浪漫制造的“新式的人祸”。时代的风气，学术的风气，知识分子的劣性，家国天下的多难，历史文化的绝续，这一切引发了牟先生的“客观的悲情”，激发他一生致力守本、疏本、立本——返本开新的疏通中国文化生命的哲学创造。

哲学的天赋、哲学的潜质和读哲学的头脑在学思生命中是一定会开发起用的。唯其如此，牟先生从时风士习中超拔，生命当下归其自己，即收摄精神，并能很快进入哲学工作，自力翻译怀悌海（Whitehead，1861—1947）的《自然知识之原则》与《自然之概念》（译稿留存家乡，1949年后毁）；自学治《易》，至大学三年级完成《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及道德哲学》四百页大著（1988年台北重版更名《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其著虽为牟先生自视为不成熟的少作，但它却在中国历圣相承的“仁教”之外，彰显了另一羲和的“智学的传统”，显示了极高的哲

学天分，而获李证刚、林宰平等师辈的赞许，张东荪称“唯有牟君这样的研究古籍始足为‘哲学的’”。他更接上儒学在当代的学脉，为当代新儒家哲学开山大师熊十力所赏识。熊先生尝言“宗三出自北大，北大自有哲学系以来，唯此一人可造”。牟先生谓从熊先生对时风士习的狮子吼中，始见“能通华族慧命而不隔”的“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由是开出回到“存在的领域”而契悟关于生命（个人的与民族）的学问之向上一机。从此，师生慧命相续几十年，使当代新儒家困顿履渐，发扬光大。

至此，我可以指出，牟先生从乡村走出来的特殊意义。“安土敦乎仁”，是牟先生的生命底子，亦是他学思生命的本根。他是带着生命的本根，带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和源头活水，带着哲学的天赋、哲学的潜质和读哲学的头脑走出来的，或者说，他是作为中国文化和儒学的种子走出来的。这将决定他一生坚持孔子的立场，走孔子的路线。他对他的学生们说：“我忠于我的所信，一直贯彻下去。我走的是孔子的路，我的立场是纯粹哲学的立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立场。我和唐（君毅）先生都是这个立场，就是孔子的立场。”（《先秦儒学大义（七）》，《鹅湖》2007年11月）牟先生是天造地就的哲学家，是天造地就的大儒。

三、典范的学思生命

自入北大每天到图书馆读《朱子语类》，学思生命七十年。牟先生是哲学和儒学大师，这“大师”不是由于当今时代慷慨赠予的名，它是实，是三十余部印行的著述、译著、讲演录一块砖头一块砖头堆砌夯实的。这三十余部，还有未入编台版《牟宗三先生全集》的十种哲学讲演录，思想深邃了明，文化义蕴丰富，即使是文集所收亦无不是文化意识贯串流溢的睿智碎金，皆牟先生动心忍性、长途跋涉的学思结晶。它展现了牟先生学思生命和牟宗三哲学的大悲情、大智慧、大气象、大格局和典范意义。牟先生的学思生命和牟宗三哲学一体存在。亦可分别说，非分别说。此一体存在，完成了牟先生对中国哲学儒学的当代典范之创造。

分别说则牟先生的学思生命展现出开放、担当、独立的形态或说研究形态，这是即存在即超越的形态，也是品格，构成其时代典范的学思生命。

牟先生的学思，其领域是广大的，其心态是开放的，面向宇宙，面向历史，面向时代。面向宇宙而信而有《大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的宇宙情怀，指出各归其位建立自身的存在价值即是人类的文化建设与文化问题。面向历史而不论反省中国文化还是疏导西方哲学必从观照历史开始，从头疏解华族文化生命、学术命脉。而最后落实到面向时代，而揭抉近现代整个人类世界的文化症结和时代病，此症结即人类精神之量化、外在化以至量化的极端化。唯此亦激发牟先生自述一生“为人类价值之标准与文化方向而奋斗以申展理性”（《时代与感受·序言》），对时代唤醒人之价值意识、文化意识与历史意识。

这三个面向又表现为传统与现代、中与西、哲学处理与文化处理三个结合的学思路数与特点。本内圣之根据以开外王的思想总纲，其基本理路即集中表现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特点。自大学时代潜读罗素、怀悌海哲学起，凡从古希腊哲学到西方近现代哲学，牟先生皆有论述与深见，《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是他消化西哲的一个结晶。牟宗三哲学思想体系亦是他由分判而会通中西哲学的硕果，以致台北辅仁大学校长罗光（罗马教廷台北区大主教）教授以“企图融合中西哲学以建立新儒学”来评述牟先生的学思历程，牟先生认为文化问题说到底是哲学问题，时代问题归到核心即是哲学问题。并具体地视“学术生命之畅通象征文化生命之顺适”（《五十自述·序》），落实到现实的哲学工作上，即是指导时代文化发展的方向与智慧。所以哲学处理与文化处理的结合，深一层说，在牟先生是哲学智慧与文化意识的合一。在对他说他的哲学立场和哲学工作时，他即明确说：“在这个时代，你后面是还要有一种文化意识做你的动力。……你就是读纯粹哲学，后面也要有文化意识。”

这三个面向和三个结合，实在是前贤往圣“十字打开”的心灵，是“圣之时也”的孔子路线。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中，

牟先生尝诠释儒家性命天道贯通哲学，是将天道神性收进来，通出去，所展示的是一个完全打开的文化心灵，并明确提出“儒耶合作”一观念，指出此“可使天人关系的道理圆融通透”。这个诠释与观念，集中而无可置疑地展示了牟先生的哲学心灵是敞开的，向宇宙人生、古今中外的敞开。

牟先生极赞同他的挚友唐君毅先生的一个重要观念，这就是：“人自觉地要有担负。”牟先生悲心观照时代，从个人的存在感受而悲怀苍生，悲怀家国天下历史文化的大患难遭遇。他对这个大患难有大感受、大忧患、大担当。依牟先生之见，担当的精神是道德性、理想性的，是人、是儒者当有的道德实践，是孔子所豁显的儒家真精神。牟先生的担当，是以他全幅生命，以他悲智双运的学思，承当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活转圣贤的学问与人类的理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在儒家遭四国之战中，“以生命顶上去”！“以生命顶上去”，表现了牟先生担当精神的凝重、刚毅、艰难，豁显了其担当的存在性，是“存在的担当”，亦是“义理的担当”。这个从“存在的感受”到“存在的担当”，是牟先生学思生命所展示的基本的生命形态与学问品格；它也厘定了当代儒者以及处于大患难时代的当代知识分子应有的生命形态与学问品格。而牟先生集大感受、大忧患、大担当于一身，也就是一大悲、大智、大勇统一的生命，则不仅是当代也是任何时代读书人的人格典范。

尤有时代意义的是，树立了独立不倚的研究形态。研究形态与生命形态直接关联。在牟先生，研究形态与生命形态完全统一。牟先生的生命形态和研究形态是外绝声华、独立不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四无傍依。用唐君毅先生的话说，是特立独行。唐先生以特立独行著称，但是，牟先生比他还特立独行。

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尤其表现在与现实政治权势的关系上。牟先生向来藐视权贵，外绝现实政治对学术的干预，痛恨学术研究与政治权势纠缠在一起，学问与现实政治混杂在一起。我看到一则材料，说还在人文友会时期，有学者演讲《大学》时引用孙中山、蒋介石的言论，牟先生竟当众予以痛斥，一点情面都不留。现实

政治权势是从外面来的对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的最大威慑，一旦与其纠缠在一起，你的独立性就会保不住。牟先生将独立性视为学术研究的生命。在《时代与感受》一书里，他强调学术王国的独立性，是教育学术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如果学术不能在现实政治面前坚持独立性，那么就只能做清客、帮闲。牟先生还极明确地说过：“我不是站在任何现实的集团、现实的利益上”，“我的依据不是现实的任何一面，而是自己的国家，华族的文化生命。”牟先生“是站在价值之源生命之源的精神实体之肯定上”（第116、122页）来学思肯否的。牟先生的独立形态即此透出超越意义。就此可见，牟先生的学思生命是壁立千仞的人格生命。

这个独立、超越的形态，可以由牟先生《哲学智慧的开发》（收入《生命的学问》）得到意义诠释。其中讲哲学研究三种预先必备的心境，也是三种哲学的气质：一是要有汉子气，二是要有逸气，三是要有“原始的宇宙悲怀”。这三种心境，也就是勇、智、仁。遮拨地说，就是要你对一切富贵名利都不在意，把心思从外面的牵连中收回来，从一切外在的套套粘缚中超拔出来，从冻结的现实中超拔出来，从物欲习气中超拔出来。牟先生说，若你终不能有这样的心境、这种气质，你即不能有哲学活动。

其实这三种哲学活动预先必备的心境、哲学的气质，是牟先生夫子自道；即对学术研究所需的独立形态而言，也是个内在的说明、哲学的说明与阐发。独立的研究形态是哲学智慧开发的要求，是哲学活动、一切学术活动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学术研究如何从现实政治的笼罩中独立出来，这个问题，中国人过去在科举套套中解决得不好。现代政治的笼罩力更大，问题的严重性有过之无不及。这里，牟先生学思生命的示范意义显而易见。他的独立不倚，他对独立性的见解，他对哲学智慧的开发，即是对这个问题的最佳解答。

四、开创儒家型的哲学诠释学

成就牟先生对中国哲学儒学典范创造的，还包含着一套方法

论的贡献。牟先生实际提出了一套具有现代诠释学意义的方法。它有四个要点：①客观了解，②根据文献，③扣紧问题，④生命进路。表现出两个基本特点，一是重文献与重问题的研究之统一，也就是中西方哲学研究方法的统一。二是客观了解与生命进路的统一，也就是主客观的统一。“客观的了解”，牟先生或说“恰当的了解”、“相应的了解”，可视为补充说明。生命进路，则有“生命存在的呼应”、生命的实感、把哲学问题“和你的生命连起来”、“扣紧文化生命讲”、“相应的生命性情”等意涵。牟先生说，客观的了解必进至理性之了解，而理性之了解亦非只是客观了解，要能融纳于生命中方为真实，且亦须有相应的生命为其基点（《心体与性体·序》）。这主客观的理路是说，人的理解与诠释活动有其客观性，亦必须坚持“客观了解”的理解与诠释原则。这个客观性必进至理性的层面上始有可能，而必须有主观的生命“契悟”之加入，才能达成。这个理路正是现代诠释学的基本观点。对牟宗三哲学方法论所具有的这个现代诠释学意义，是牟先生高足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李明辉兄首先揭示的，我深表赞同，亦自有理解论文（《客观的了解与创造性的重建》）。其实，生命进路云云，亦正是由儒家传统“逆觉体证”的功夫论方法论所转出。

牟先生的哲学方法不是一口说、一书写的主张，而是通贯其著作，与其著作一体的学术实践。牟先生在晚年讲课时说过：“我一生做客观了解。我读书的时候重视客观了解，到现在我还是做客观了解。……我写那么多的书，都是客观了解呀。”确然。再譬如根据文献，牟先生对文献下的是“坚壁清野”的工夫。中国哲学文献如宋明理学，言词颇多艰涩、滞碍。但牟先生与有些名家不同，于艰涩、滞碍处不回避、不模糊、不打马虎眼、不臆说，他整篇整段，甚至逐字逐句地疏释，有辨有断，不厌其详，细针密缝。这个文献工夫，至今没人做得到。所以读牟先生的书，还能帮助你读懂文献。

牟先生的哲学方法论，其具体阐述，除了见于《心体与性体》自序，及《客观的了解与中国文化之再造》（《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7卷）外，《中国哲学十九讲》中有较集中较多的言论，足以开创儒家型的哲学诠释学。

五、消化西学，全译康德三大批判 开显中西哲学会通之坦途

牟先生的哲学创造之意义，由其哲学儒学贡献的内容而朗现。其内容大体是三部分。其中，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是非常显著的一部分，成就非常高。他是由治西方哲学、逻辑而进入哲学之门，进入“架构的思辨”，进入真正的哲学工作。他治怀悌海而兴发宇宙论的兴趣；治罗素哲学、数理逻辑及其高足维特根什坦名理论，一方面由是接上西方哲学的纯理论的理路，一方面作扭转式的研究（后来著《认识心之批判》的一个目的即是想以康德的思路来消化二氏的思想）。牟先生尝说：“对于逻辑与数学的解析之扭转，与夫归于‘知性主体’，敲开‘认识主体’之门，‘超越的逻辑我’之建立（按：此即《认识心之批判》的成果），这使我真正地进入哲学之域，我得到了在哲学上独立说话的思辨入路，我已确然涌现了安排名教，说明知识，进窥形上学的全部哲学系统之架构。这就是我所谓‘架构的思辨’。这是一步积极的，真正的哲学。在这部工作上，我接近了康德。”（《五十自述》）由于治西方哲学的实战训练，所以牟先生的分析本领特高、哲学诠释和哲学说明能力特强，从学术上说，这皆赋予了牟宗三哲学特强的哲学专业性，铸就了牟宗三哲学儒学的显明的现代风格。

对自希腊传统到现代存在主义、现象学，牟先生自有一系统的疏解。他以西方哲学的精华集中在三大系统或说三大骨干：①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下賅圣多玛斯的神学；②莱布尼茨、罗素，旁及经验主义、实在论等；③康德、黑格尔。牟先生疏解西方哲学旨在会通中西，会通之途则指向康德。他著《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论述中西哲学会通的根据与限制，从哲学真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会通”作哲学说明，并由莱布尼茨至罗素这一骨干契入，疏导至康德哲学。在《四因说演录》中，又借对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分析为入路，论衡西方哲学、基督教神学与中国儒、释、道这人类五大智慧系统，互为考量，指示与厘定由希腊哲学通向康德桥梁的基本脉络与途径。

西方哲学的三大骨干中，牟先生认为康德的全部思想是“经验的实在论”与“超越的观念论”；前者开“感触界”（现象界），后者开“智思界”（本体界）。由是综合与消化了实在论与理性论而形成传统，救住哲学，建立哲学，而自古希腊到康德以前的哲学亦都汇总到康德。牟先生认为康德顺希腊的传统而进一步提出实践理性优越于理论理性，把握住善的意志及意志之自由，此大有关于道德的实践。因此，指认康德哲学最后的总走向近于儒家，近于中国儒释道三教传统所昭显的格范，而以康德为通中西文化之邮的最佳桥梁（《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译者之言》）。由是牟先生自1964年64岁译康德《道德底形上学之基本原则》起，直到1991年83岁，锲而不舍，依英译版，全译康德三大批判，并用中国哲学的理念加注疏释，以为引导。这是哲学家的翻译，不是翻译家的翻译。此在中西哲学界堪称创举，完全可媲美于唐僧玄奘法师之译佛经。牟先生哲学理论与哲学史实际相结合地开显了中西哲学会通之途，亦是为中国文化开启了消化西学的新路。

会通背后有文化关怀、生命关怀，会通之旨则在建立共命慧以解消时代之文化症结，更落实在中西相资互益，疏通中国的学术生命，为中国文化和哲学儒学发展出新生命。牟先生明确视中西哲学之会通为一对治时代文化问题的文化核心工作，所谓核心工作，就是要指导文化发展的方向与智慧。依牟先生之见，对中西哲学之会通的道理，人类若能看明白，就能使生命通透，认清方向，具备解消这个世界价值标准、真理标准歧分的智慧，而互相沟通（参阅拙文《分判与会通——读牟宗三先生〈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在牟先生的会通中，恢复了中西哲学共有的“实践的智慧学”古义，朗现了“一心开二门”为中西共同的哲学原型和哲学间架，将中西智慧系统提升到一更高普遍性的大综合大融通。

六、恢复生命的学问，重建道德的形上学

牟宗三哲学的另两部分内容是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他是

就着中国哲学史之疏理而诠释中国哲学、反省疏通中国学术文化生命的，故这两部分内容既可分别说又联成一体，是哲学史的研究与哲学的创造之统一。而无论是哲学史的研究，还是哲学的创造，其思维特点都是方以智的分析智与圆而神的通慧之统一。

牟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历史哲学》、《名家与荀子》、《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蕺山》，虽各有专题，独立成卷，其实又共有一中心，贯串相连，是一整体的中国哲学史论。牟先生以“存在地呼应”圣贤生命为进路，坚持哲学文献的途径，顺中国哲学儒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扣紧中国哲学儒学的中心问题，把握一个一个重要观念概念，并比衡康德西哲，步步体认，层层分析，义义厘定，别异简滥，会而通之，使一部中国哲学史儒学史主题豁显，异同朗然，脉络分明，畅通无碍。其中精彩处，多绝妙无伦。如宋明理学三系划分，可谓奇峰突起；二程简别，无人做过；以“别子为宗”判朱子，石破天惊，绝对漂亮。这种史的哲学研究工夫、“哲学的”研究古籍，硬是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提升到顶尖水平，里程碑水平，堪为典范。

牟先生对中国哲学儒学的总贡献，或者凝聚至其学问与思想总体上来说，就是恢复“生命的学问”，重建“道德的形上学”（《道德的理想主义》）。

在20世纪的学界，牟先生首先提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学问”。所谓“生命的学问”，一言之，就是以生命为中心的学问。这是牟先生对中国哲学的根本性质的厘定，亦是从与西方哲学以知识为中心的学问之简别中凸显。这里说的生命，不是生物学的生命，是道德实践中的生命。牟先生厘定的“生命的学问”，可以从两方面讲：一是个人主观方面的，一是客观的集团方面的。前者是个人修养之事，个人精神生活升进之事，如一切宗教之所讲。后者是一切人文世界的事，如国家、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事”，即“生命之客观表现方面的事”（《生命的学问》）。故“生命的学问”亦是对儒家内圣外王学的一个概括。“生命的学问”之意义在贞定吾人生命，在使人的生命纯净化，个人目标

在成圣成贤成以万物为一体的大人仁者，或如佛道的修佛菩萨、修仙真人。在成己中成人成物化成天下，这就是儒家的成德之教。儒家生命的学问即是“明明德”的学问。牟先生认为儒释道都是生命的学问而皆有诠发，但因儒家成德之教成己成物合内外道，而归宗儒家。牟先生说他自己被打落在“存在”的领域中，乃发愤从事文化生命之疏通，以开民族生命之途径，重开生命的学问。而“生命的学问”即在提高人的历史文化意识，点醒人的真实生命，开启人的真实理想。

依牟先生的诠释，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是一本体宇宙论。其要义是，人能顺道德的实践之心而健行不息，自能证实人天所同之道——仁。就是说，仁为宇宙万物的本体，仁体即道体。就着主体说，仁是心理合一的心、怵惕恻隐之心、道德的心、良知等等。它是发动理想的一个最根本的源泉，人的一切活动，一切实践，皆不能离此道德的实践之仁心而别有所本。而道德的实践则不能离开现实生活，尤其不能离开历史发展中的集团生活。牟先生即此而说道德形上学的彻头彻尾的实践性。牟先生又本孟子尽心知性的理路，就心说性，就心明性，即必须从心理合一的仁处言人的性、了解人的性。而仁心是随时可以指点的，也是随时可以指点的。绝对的善乃称人心而发的。由此所见的理性是理想的，由此所见的理想是理性的。由仁心而极成理性主义的理想主义或理想主义的理性主义（《道德的理想主义》）。故心体即性体。故牟先生重建的“道德的形上学”是人文主义的亦是理性主义的，亦是“实践的形上学”。

牟先生哲学的创造，集中到一点，亦就是创造性重建“道德的形上学”之创造，就是充实和完成了“道德的形上学”的大构架大体系：通过分判与会通，圆融儒道佛康德而建构的“一心开二门”的两层存有论体系。这是牟先生步步学思，步步纠正（如康德哲学之不足），步步比对，步步参透而建构的。由人皆有智的直觉不能单划给上帝（如西方神学、如康德）而肯认中国传统之肯定“人虽有限而可无限”而证成。这也是牟先生“长期无偏执的学思工夫”（《现象与物自身·序》）的结晶，相应的著作是直接表述